



2023年8月19日

星期六

新闻热线:38166899
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东坡里

(第8期)

主编 周军 编辑 毛馨怡  
 美编 张莉 校对 李泓莹

东坡画竹图

# 文人 茶人 苏东坡

□四川眉山 朱小根

据《全宋诗》统计,在北宋以茶为题的茶诗约有300余首,其中苏轼咏茶诗中以茶为题的有21首左右,诗中言及茶的有55首左右。这些诗词承载了大量的茶文化信息,也折射出苏东坡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。

## 文人与茶事

苏东坡的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懂茶、爱茶,深得其中三昧,以茶会友,思茶入梦,并以茶人诗,创作了大量与茶有关的诗词文章,茶在他的生活情趣、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中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。茶兴于唐,盛于宋。宋代的茶文化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无论是外在的技艺,还是内在的思想追求方面都达到了整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巅峰。

苏东坡对饮食起居很有讲究,饮茶为午时茶(中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),饮酒为卯时酒(傍晚五时至七时)。苏东坡在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,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时作的《浣溪沙》词中,提到“午盏”,午就是指的饮茶时间为中午,盏就是指装茶水的杯盏。苏东坡对饮茶的功效,其认知与风格和唐代诗人基本一致。古时候,文人墨客们认为饮茶具有解渴消渴、消烦清心、兴奋提神等作用,并且普遍认为茗茶是心灵美的感受。苏东坡还认为,茗茶具有很高的审美意识,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据《东坡茶》一书所述,苏东坡所生活的宋朝,被定性为“茶性格的王朝”,并对“茶性格”做了解读:“冲淡、静笃、隐忍、隽永,还有潜流暗涌的奢华。”这本书还做了一些茶叶与文学的融合添加,比如“鲜

新”,比如“精到”,比如“素雅”,比如“清高”,比如“芳香四溢的温润”。茶叶,无论平直形状或卷曲形状的工艺制作方式,它都会是或浓或淡的一杯茶水,皆有文化内涵,都是可以无限延长的一条生命,可以无限加深的一片海洋,甚至可以无限放大的一个世界。张花氏说,眉州是“茶的故乡,茶的母地,茶的祖庭”。事实上,扩大之大,“眉州”可用“四川”来替换。迄今为止,全世界发现的最早记载茶事的文章出自四川资阳人王褒之手,他在《僮约》中所言“武阳买茶”,也发生在成都及其相邻之地。仅此一项,似可认定四川自有着“茶性格”的一面,何况当今四川的茶馆文化,地球人都知道。以茶为四川立名,以茶马古道为四川扬名,这是近年来四川文化人不遗余力所做的一件工作。

## 趣闻与轶事

苏东坡的一生,因任职或遭贬谪,到过许多地方,每到一处,凡有名茶佳泉,他都要汲水煎茶。他饮茶十分讲究,在《汲江煎茶》一诗中可见陆羽遗风。他的许多朋友欧阳修、黄庭坚、参寥等也十分爱茶,他们以茶为纽带和桥梁,一起品茶品味人生和文学,从他的诸多茶诗题目中安中可见一斑:《和钱安道寄惠建茶》《和姜夔寄茶》《寄周安濡茶》……苏东坡留下了不少隽永的茶诗、茶词、茶联,还流传着许多茶事典故,传为美谈。

趣闻:东坡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,非常讲究饮茶,有所谓“饮茶三绝”之说,即茶美、水美、壶美,惟宜兴兼备三者。俗话说:“水为茶之母,壶是茶之父。”苏东坡对烹茶用具很讲

究,他认为“铜腥铁涩不宜泉”,而最好用石烧水。据说,他在宜兴时,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,烹茶审味,怡然自得,题有“松风竹炉,提壶相呼。”的诗句。后人为了纪念他,把这种壶式命名为“东坡壶”。

轶事:苏东坡在杭州,一日以病告假,泛舟独游西湖。白天访了上净寺,惠昭寺,小昭庆寺。黄昏时分,又去了孤山,拜访惠勤禅师。惠勤禅师当时在智果寺,寺旁有两个石制金刚拱手而立,寺内神像高大,头部快碰到屋顶。智果寺院内的石缝中有泉水流出,味道甘冽,适合泡茶。惠勤禅师知苏东坡来访,备下茶注、茶铫、茶瓯,汲取泉水放在火上烹煮黄粟茶,直至泉水翻起蟹眼。惠勤禅师将一盏酽茶递过,苏东坡一饮,顿感十分香美。那日,苏东坡一高兴,想起了唐朝诗人卢仝“七碗茶”之说,苏东坡便追逐卢仝一连喝了七碗,饮后神清目爽。晚上,苏东坡雅兴大发,握管题壁:

示病维摩元不病,在家灵运已忘家。

何烦魏帝一丸药,且尽卢仝七碗茶。

## 文笔与茶道

苏东坡一生爱茶、嗜茶更懂茶,茶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事物。苏东坡从茶中品出生活的真味,世间的真情、人生的真谛。茶,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?当然是消暑解渴。他在元丰元年(公元1078年)上任徐州知州,正赶上当地大旱,因行色匆匆,口干舌燥,最为渴盼的是讨得一杯清茶解渴,他写了一首《浣溪沙》,下阕云:“酒困路长惟欲睡,日高人渴漫思茶。敲门试问野人家。”由于路途遥远,又喝了一些酒,诗人困乏交加,昏昏欲睡。此时骄阳高照,更觉口渴难耐,若有一杯清甜的茶水解渴多好!诗人就近敲开了老乡的家门,问讯可否讨一碗茶喝?在这里,茶成了诗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。

苏东坡还给海南的朋友赵梦得写茶帖,邀请一起喝茶。《致赵梦得一札》云:“旧藏龙焙,请来共尝。盖饮非其人,茶有语;闭门独嚼,心有愧。”有上好名茶,非请赵梦得会饮不可,可谓相知也。这是苏东坡的饮茶之道:只有配饮佳茗之人可以分享,否则佳茗也会有意见的。他也不会独自享用,因为他觉得如此佳茗不与知己好友共饮,心中会惭愧不已。苏东坡邀其得意门生姜唐佐喝茶,也写过类似的茶帖:“今日雨霁,尤可喜。食已,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,念非君莫与共之。”有好茶好心情,自然要请知己好友一起分享。因而在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感慨道:“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,姑且燃起新火,烹煮春日里刚采的新茶。忘却尘世间一切烦恼吧,对酒当歌,不负眼下这大好春光啊!

东坡茶,是苏东坡自创的饮茶方法:每餐后,以浓茶漱口,口中油腻既去,牙齿也得以日渐坚密。用中下茶漱口,而上等好茶不易得,“间数日一啜,亦不为害也”。苏东坡烹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,他认为好茶还须好水配,“活水还须活火烹”。苏东坡观察到野生茶树烧后仍然会新芽再生,茶青一芽一叶的形态,被形象地比喻为一枪一旗。东坡诗中的“茶枪”,指茶芽未展,

尖细如枪;茶叶已展,犹如旗帜,则被称为“茶旗”。他还在《试院煎茶》诗中,对烹茶用水的温度作了形象的描述。他说: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飏飏欲作松风鸣”。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。

## 文化与影响

茶的形体是千姿百态的,它的味道也是千变万化的;茶作为一种文化,一种生态文化,一种可以雅俗共赏的文化。苏东坡将茶比作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,可见茶是人文风貌和精神文明的象征。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什么爱喝茶,那是因为:喝茶有益,喝茶有礼,喝茶有道。

中国是茶叶的故乡,茶文化源远流长。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它囊括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,茶也代表着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,如今茶与我国现代人民的生活关系密切。据记载,中唐以后,茶便成为了日常消费品,并开始收税,这标志着茶业的成熟。苏东坡把茶当作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,他在《水调歌头》的词作中,就把饮茶之乐比作升仙。苏东坡饮茶的境界,是以津津细品、并得其味,以味入诗,道出文化和人生品味。他,是我国茶文化史上神一般的存在;他,是正宗的茶人;他,连做梦都在喝茶;他,是宋代饮茶人的典型代表。苏东坡,他的一生是纯乎茶的一生。

(朱小根: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、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,研究生学历,文学硕士,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政协第五届眉山市委员、洪雅县作家协会副主席)

## 鱼池

## 在眉山三苏祠写两茫茫(外一首)

□四川成都 龚学敏

一个翻新的词,把月光系在汽车水做的轰鸣中。  
 满月的字,从书写黄荆的正午熟透,用睡眠的羽毛饮酒,  
 伏在地名们两茫茫的铁轨上。

与玻璃说笑的茶,把时间晾在草书的钟声里。  
 纸扇,一律姓东坡,  
 把风吹出来的女人印在透明的书中,  
 让熬过的夜景仰。

蓝色相机的荔枝,用掠过的胭脂红泡制,  
 给诗词们救命的手术刀。

被竹林长乱的我,用说出的话食肉,  
 在火锅中搭建遗失的笔画。

被晒宽的街上,  
 三裸贩卖布匹的银杏,把打成捆的阳光,装进摆渡车的啤酒。  
 一枚洗过的字,坐在书的封底,  
 看着他的情人,  
 正在用月光,制作千里远的东坡酱。

## 在眉山三苏祠,饮茶

宋词中萌芽的茶叶,精致成一枚月光。  
 祠堂蛰伏在光阴的午后,  
 蝴蝶用线装瘦清,像是一枝竹,  
 泊在纸上的声音。  
 她们在远处的竹寮,  
 翻检词牌,把透明的翅,  
 叠成玉做的鱼。  
 让我用十年的时光,茫茫,再茫茫,  
 不知生死。

一片茶,拂袖而去。像是秋天天的清晨,  
 闻风而动。

花朵们凋零在自己玻璃的芬芳中。  
 这是蝴蝶饮茶的缘由。  
 在宋词中饮茶。只需一盏,敬苏姓的鱼。  
 月光情不自禁,可以千里。  
 可以把自己饮成宋词,  
 被鸟鸣挂在枝头,伸进,  
 毛笔写出的好水中。

(龚学敏:四川省文联副主席,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《星星》诗刊主编。著有诗集《幻影》《雪山之上的雪》《长征》《四川在上》等)

## 眉山入语

## 在故宫,遇见眉州东坡(五)

□北京 邵思思

王安石需要劳神知晓的。

王安石的变法的内瓤让向来“以民为本”的苏轼怒不可遏,多次上书神宗皇帝力呈新法的危害。1071年,垂拱殿里,苏轼第一次得到神宗皇帝的亲自召见。他明确向皇帝指出“陛下有天纵之才,文武兼备,然而当下改革,不怕不明智,不怕不勤政,不怕不决断,只怕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入太锐。所以,还请从容一些,安静一些为好”。

苏轼更看到,王安石相业,会让北宋历经百年确定的“儒家治国”理念重回法家思想。作为儒家思想的膜拜者们,北宋的士大夫们坚信在皇权之上还有“天道”,因此宁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在道义上与皇帝一争高下。王安石却认为:“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不足法”。这句豪迈无双的句子里其实藏着深刻的危机——要知道本来皇帝的权力就无远弗届,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、软性的约束,这些约束不过就是天(老天)、“人言”(社会舆论)以及列祖列宗(本朝的列祖列宗)。但王安石却告诉皇帝:老天、舆论、列祖列宗玩意通通没啥了不起,皇上你想做什么就去去做吧。相当于把皇权上的枷锁完全全解开了。这不啻是北宋政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!

苏轼实在无法在这样的朝堂待下,于是自求外放,调任杭州通判。任满后,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知州。在地方任上,他政绩斐然,深得民心,当然也引起了嫉恨。在湖州任上,发生了差点害他被砍头的“乌台诗案”,这件事的代表着“变法”由观念之争完全演变成朋党之间的倾轧与报复。英宗驸马王洙是苏轼的粉丝,提前将消息通

过苏辙告知苏轼,此时的苏轼还并未感觉到危机的到来,有人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,他还自我调侃道:今后可不愁皇帝看不到我的诗喽。

台吏们对苏轼毫不客气,一州知州被他们如鸡犬般被推搡出门,还嫌不够,还企图把苏轼的朋友一网打尽,这些人包括通风报信的驸马王洙、重臣张方平、司马光、范镇,累计三十多位,他们试图给苏轼安上谋反的罪名,让他身首异处。然而一介书生又有何谋反的本钱?口无遮拦,这是他唯一的软肋。

在太皇太后的力保下,苏轼最终保住了性命,被贬黄州,做团练副使。驸马被削去一切官职爵位,苏辙贬官筠州,王巩迁往宾州,张方平、黄庭坚、司马光等十几位好友均受到罚铜的处罚。让苏轼感到意外的是,他的对手,此时已隐退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为他辩护。当年他从眉州走出,向往的就是这股“异论相搅”“共治天下”的庙堂之风。看来,世道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!

王安石以“拗相公”之名闻名于世,同僚之人皆为其难于合作。新法开始之后,果不其然,遭到了同僚的强烈反对。王安石对这些同僚毫不客气,凡是提出与他相异的意见,均被诋毁为“流俗之见”,他的狂狷让人避之不及。为了控制朝廷舆论,他几乎把整个台谏清空,并把是否支持他的变法作为考察人事任用的唯一标准,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蔡确等人都是被王安石一手提拔的,但这些人恰恰都是品德极为糟糕的人,后人编《宋史》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纳入“奸臣传”里。王安石罢相后,这帮人人职中枢,和王

安石不同,在他们眼里,“变法”并不是观念之争,而是打击异己的手段。他们挥舞“变法”的旗帜,把那些对变法有异议的人全部打入另册,并择机迫害——苏轼这个名满天下的新法反对者,自然就是他们选中的目标。

在迫害苏轼的人中,最让苏轼意外的莫过于沈括(《梦溪笔谈》作者)以及章惇,两人都曾是他的密友,因此在他们面前,苏轼才如此坦率真诚,他们却把苏轼送给他们的诗集逐条批注,构陷他“词皆讪谤”,试图在政治上彻底搞臭他。

其实苏轼对王安石新法并不是“无脑反对”,苏轼反对最厉害的是“青苗法”。所谓青苗法简单说来,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,以较低的利息(20%的利率)将常平仓、广惠仓里的粮食借给老百姓。等到秋收以后,再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。但是这种“官与民争利”的行为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,老百姓不仅没拿到好处,终年劳作下来还欠了官府一屁股债。对免役法,苏轼是赞赏的,任职密州时还也曾推行过田募役法,就是在王安石免役法基础上的调整。许多年后,当王安石变法完全被推翻时,苏轼还对免役法的废除十分惋惜。

由“乌台诗案”确立的朋党之争,在往后的岁月里,极大地耗损了北宋王朝的元气。“朋党之争”虽不是王安石故意为之,但却是由他而起,他的变法开启了一种新的更加专制的、更加缺乏宽容性的政治模式,北宋王朝由此转向。

(邵思思,眉山青神人,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,《同舟共进》北京特约记者)